

历经磨难 鲜为人知 倍加珍惜

徐悲鸿油画《溪我后》的三次修复

■ 刘名

徐悲鸿油画《溪我后》

被誉为“中国美术复兴第一声”的油画《溪我后》，是徐悲鸿巨幅历史题材代表作之一，它和徐悲鸿的另一幅油画《田横五百士》一起，为油画民族化开辟蹊径，奠定了中国油画的基石，成为中国油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故事取材于《书经》，描写的是夏桀暴虐无道，民不聊生，商汤带兵去讨伐，受苦受难的百姓渴望得到解救，企盼明君的到来。于是便说“溪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等待我们贤明的圣君，他到了我们就得救了。”

《溪我后》创作于1930年至1933年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以后，大片国土沦陷，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及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徐悲鸿用画笔呐喊，将男儿的一腔骨血融于《溪我后》的历史典故之中，将自己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奔腾于尺幅之间，表达了“还我山河”的殷切期待。

正如徐悲鸿所说“美术虽为小技，但是它可以立大德，创大奇，为人类申诉”。徐悲鸿几易其稿，历时三年，才完成这幅中国美术史上的鸿篇巨制。《溪我后》展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社会上引起经久不衰的强烈反响。

为了实现“所有文艺的最终归属只有在服务社会公共文化中发挥作用，也只有在得到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也为了做到对长期展出文物作品的妥善保护，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对油画《溪我后》已经进行过三次修复。

油画《溪我后》的第一次修复

1953年9月26日，因突发脑溢血，徐悲鸿倒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工作岗位上。为了纪念徐悲鸿为我国美术事业的贡献，1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在中山公园中山堂联合举办了徐悲鸿遗作展，展出徐悲鸿精品画作油画、国画、素描和粉画共226件，其中油画《溪我后》的展出有段艰辛的故事。

据徐悲鸿的学生戴泽先生介绍：“徐先生去世，中央美院与中国美协随即筹办徐先生遗作展览，时间很紧。筹备地点在民族美术馆所刚完工的两层新房里，吴为同志负责全部总务，我负责油画的整修工作和配框。《溪我后》是打电报从南京用长木箱运来的。”

《溪我后》从南京而来这件事情的原委，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生前曾详细地讲述过。作为徐悲鸿最主要的作品，《溪我后》是徐悲鸿在国立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艺术系任教时画的，后来，这幅画曾一度挂在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里。悲鸿去世后要举办遗作展，就想到了这幅画，于是向南京找寻。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多灾多难，尤其是南京，遭受了日本人的扫荡摧残，又经历了战争的硝烟，战争中人命尚且不保，何况一幅画作！《溪我后》的命运如何，具体情况，也无从知晓。所幸的是，这幅画还在中大（解放后改名南京工学院），然而却不是挂在礼堂的墙上，而是被当作遮挡物用来遮挡学校破败的窗户，日晒雨淋的，找到的时候已是不堪入目了。国立南京大学艺术系主任黄显之先生把画从南京寄出，寄的时候，



徐悲鸿 溪我后 油画 1930—1933年

他说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一点，戴泽先生便能明证。他说：“从箱里取出画，慢慢地摊在地上，画布像鱼网，糟的厉害，一拉就破，画面上有土有霉，真看不出什么了！一段沉默之后，江丰同志说算了罢。许久没人答话。我说我来试试看，大家也就同意了。离展期只有四五天时间了。我立即请木工赶作内框。打电话从‘美术供应社’买来一块亚麻布，又去颜料店买猪皮胶，在水泥地上粘了起来。沾不平，就用烙铁。哪知用烙铁更加不平了。正在着急的时候，旁边有位给民族美术研究所做家具的老师傅，提出用团粉粘。当时，韦江凡同志是民族美术研究所的秘书。经他同意让老师傅来参加这一工作。经过加班加点，很快把新布粘平了。绷在内框上了。然后在破落的地方用胶粉填补。然后上颜色，最后上光油。时间很紧，韦江凡同志也一同参加了修复工作。工作是粗糙的，前后一共4天时间。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幸好当时有关工作同志都配合密切，不像今天办事这么费劲。展出后，反应很好。南京黄显之先生说当时画是他寄出的。寄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了。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1953年12月，徐悲鸿遗作展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展出，周恩来总理亲自参观展览。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生前回忆道：“周总理很仔细地欣赏了悲鸿的每一幅画作，还特别站在《溪我后》这幅画前面，给在场的人们讲解了《书经》上的这句话，他还回顾了悲鸿创作这幅画的时代背景，说徐悲鸿针对国民党的腐败而抒写了人民对光明的渴望和期待。然后，他说成立徐悲鸿纪念馆很好，要好好保护这些作品。”

1954年9月26日，在徐悲鸿逝世一周年之际，文化部以徐悲鸿北京东受禄街16号的故居为馆址，建立徐悲鸿纪念馆，周恩来总理题写“徐悲鸿故居”匾额，郭沫若题写“徐悲鸿纪念馆”馆名，对国内外观众开放，展出徐悲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溪我后》与徐悲鸿的另一幅巨作《田横五百士》一起，成为油画展厅的主要作品，分占两个墙面，以油画特有的表现力传达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使无数观众和美术爱好者获得美的享受。

全部修完展出。第二次折腾了半个多月，还没有开始修复。修复时，发现两层布许多地方脱离。画面上也掉了许多地方。这次采用乳胶将脱离的地方粘起来。廖静文先生和何利民同志常去视察工作。馆里还派出一些同志昼夜值班。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溪我后》第二次修复工作结束。”之后，戴泽曾写过报告，建议国家派人出国考察、学习油画修复，并建立油画修复工作室或小组，强调油画工作修复室是油画的医院，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

1983年1月，徐悲鸿纪念馆在新街口北大街53号落成，《溪我后》仍占据油画展厅一面墙，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等巨作展现徐悲鸿的“美育思想”，向社会起到美术教育的作用。

油画《溪我后》的第三次修复

关于《溪我后》，戴泽先生还回忆道：“1961年苏联修画专家秋拉可夫来北京看到这张画，我介绍了修复经过。他认为修复不正规，不合规格，年久之后油画颜色会掉下来的。”

油画《溪我后》的第二次修复

关于《溪我后》，廖静文生前也还说到：“文化大革命中，纪念馆受到冲击，在周总理的帮助下，馆藏文物全部搬到故宫博物院南朝房保存。当时往外搬的时候，由于《溪我后》尺幅太大，纪念馆大门小，搬不出去，不得已，只好从画下面约40公分的地方锯断了内框，摺着画布搬出去的。一直就这么摺卷着，长达15年之久，直到1982年徐悲鸿纪念馆新馆在新街口落成。”

廖静文还痛心地说：“当年我被打成了特务，不知道是谁主持的搬迁工作，也没有人来问我，如果只要问我一声，我就会告诉他们，这幅画原来是从围墙上翻过去的。搬出时也可从围墙上搬出，用不着锯断内框。这次又给《溪我后》带来不小的创伤。”

故宫南房条件有限，特别是“文革”的十年。因为长期缺乏恒温恒湿的保管条件，徐悲鸿的油画作品几乎全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徐悲鸿之子徐庆平先生回忆道，1982年，在故宫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很多油画的颜色变酥，色彩开始剥落，画面变得灰暗，有些颜色连同底下的画布底子一起大面积脱落，《溪我后》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1982年，徐悲鸿纪念馆对油画《溪我后》进行第二次修复，这次的修复工作仍由戴泽完成。戴泽在其撰写的《修复〈溪我后〉》一文中，详细地写到：“1982年再修复时，当时的院长江丰同志，党委书记陈沛同志都热情地说‘纪念馆的事就是美院的事’，决定在美院刚落成的新楼进行。经美院同意，我们把画搬进大餐厅。过了几天，餐厅壁画的作者嫌我们碍事，一再扬言要把我们的东西扔出来。我们只好搬到另一个地方，但又被管事的同志认为妨碍了她的工作，又被轰了出来。最后，当时党委副书记洪波同志亲自出来，决定在厨房里进行修复工作。厨房当时也有人管，尚未使用。与《溪我后》第一次修复比较起来，使人感慨不已。第一次四五天

1995年徐悲鸿诞辰100周年，6月，国

家文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文联、中

国美协、中央美院、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等联

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徐悲鸿诞辰一百周

年纪念展》，油画《溪我后》也在展出之中，

在较强的光线之下，观众肉眼可见画面各

处因颜色剥落造成的小块空白，这使徐悲

鸿纪念馆在解决油画收藏保管问题的同

时，又面临着油画的修复问题。

1999年夏，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邀请了法

国博物馆著名油画修复专家娜塔丽·宾卡斯

对馆藏全部油画进行情况鉴定并进行修

复。宾卡斯在对《溪我后》现状进行深入细

致分析后指出，徐悲鸿油画使用的材料和技

法，毫不逊色于法国绘画大师德拉克罗瓦，

所以画的损坏程度比她最初想像的要好得

多。她采取五个阶段亲自对《溪我后》进

行修复：首先用医用棉花和专门的柔

和清洁剂，一点一点地清除画面的灰尘，再用清

水擦去画面上清洁剂的残留物。其次，通过多

次局部试验，确定选择合适的化学溶剂，去

掉已经变质的亮油层，同时又能保护下面的

颜色不受伤害。再次，使用不同的化学溶剂

溶解以前补上的颜色，将以往所做的不理想

修复全部去除。接下来用白色填加物修补

颜色剥落处，为了保证画面颜色层的一定厚

度，填补物处需比周围颜色低一点。最后

在白色填加处补色，为了保证在多年之后看

不出修补过的痕迹，修复者务必做到笔触、

肌理和颜色的毫无二致。

修复一幅画，显然比观赏一幅画更能

体会画作本身精妙的技艺。经过好几个月

的辛勤努力，《溪我后》恢复了光彩，达到令

人满意的程度，最后为了保护已被修复的

画面，专家还为画重新上了光油。

2018年1月26日，“民族与时代——徐

悲鸿主题创作大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

幕，展览梳理了徐悲鸿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

史价值性的系列作品，其中《溪我后》与《愚

公移山》、《田横五百士》等巨幅油画作品在

“民族精神”一章中闪亮登场；2018年3月16

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建院100周年的庆典上，

《溪我后》再次以徐悲鸿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出现在《悲鸿生命——徐悲鸿艺术大展》上，

神采飘逸、魅力十足，令观众叹为观止。

（作者为徐悲鸿纪念馆副研究馆员）